

# 壯志未酬：朱經農的教育理念與實踐

劉家峰

[提要] 朱經農被王雲五譽為民國時期的“全面教育家”，但在當代中國卻幾乎被遺忘了。他留學美國，深受杜威教育哲學影響，堅持民本主義的教育理念。他是虔誠的基督徒，鼓吹宗教教育對國民教育的重要性。在 1920 年代非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中，他高聲為教會學校辯護。他是資深的國民黨員，一生追隨孫中山，把三民主義教育宗旨與西方教育學說融為一爐。他主張大學教育的獨立和思想自由，反對政府和黨派的干涉。他是一位躬行實踐的教育家，在政學之間多次轉換，在湖南從事教育行政十多年，政績卓著。無論是為學還是為政，朱經農都以教育作為他一生的興趣和志業。但捨學從政、從政誤學也給晚年的朱經農帶來壯志未酬的遺憾，這也是那個時代懷抱“教育救國”的知識分子共有的遺憾。

[關鍵詞] 朱經農 全面教育家 政學轉換 教育救國

[中圖分類號] G40-092; K25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 (2020)03-0078-12

## 前言：被遺忘的全面教育家

朱經農(1887~1951)，祖籍江蘇寶山縣(今屬上海)，生於浙江浦江縣署，其父當時任該縣縣令。八歲喪父，全家投奔在湖南做官的叔父朱其懿。1904 年朱經農赴日留學，1905 年由黃興介紹加入同盟會。同年底因日本政府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留日學生集體退學抗議，朱經農回上海參與創辦中國公學。辛亥後，赴京擔任《民主報》與《亞東新聞》編輯。1916 年以留美學生監督書記身份入華盛頓大學，1920 年畢業後入哥倫比亞大學，深受杜威教育哲學影響。1921 年應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學教育學教授。1922 年轉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主編新學制教科書及教學參考書，被全國很多中小學選用。1924 年任滬江大學國文系主任與教育學教授。1925 年五卅慘案後，參與創辦光華大學，任教務長、副校長。1927 年出任上海特別市教育局局長，1928 年轉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普通教育處處長、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長、教育部常務次長。1931 年短暫代理中國公學校長，後轉任齊魯大學校長。1932 年任湖南省教育廳廳長，長達十年半。1943 年擔任中央大學教育長，後轉任教育部政務次長。抗戰勝利後回上海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光華大學校長。1946 年作為教育界國民大會代表參與制憲會議。1948 年 11 月作為中國政府首席代表赴黎巴嫩參加聯合國文教會議，後留居美國講學著述。1950 年任職哈特福德神學院(Hartford Seminary)，研究中國教育史。1951 年 3 月 9 日，朱經農因心臟病突發猝逝於美國寓所，享年 65 歲。<sup>①</sup>

從以上所列朱經農簡歷來看,他從 20 歲開始投身教育,在 45 年的職業生涯中,或在學校教書育人,或編寫、出版教科書,或在學校和政府主持教育行政,其所從事的工作都是直接或間接與教育有關。王雲五在朱去世後這樣評價他對中國教育的貢獻:“致力之勤,成績之優,方面之廣,範圍之遠,就余所知,國內尚不多見”,並因此美譽朱經農是“全面教育家”。<sup>②</sup>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兼出版家、學者和詩人,在當代中國卻幾乎被遺忘了。與同時代的晏陽初、陶行知等教育家相比,學術界對朱經農的關注和研究就太少了,這跟他對中國教育的貢獻極不相配,其中原因或許與他長期在國民政府任職、鼓吹三民主義教育宗旨有關。最近幾年有所改觀,已有幾篇文章對朱經農的人生經歷做了梳理和研究。<sup>③</sup>本文擬在已有研究基礎上,以朱經農的教育理念和實踐為中心,對朱經農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教育理念的形成做一補充,這是以往所忽略的;同時,擬對朱經農在教育實踐中政學身份的多次轉換再做探討,以說明他究竟是“游刃有餘”還是“游移不定”。討論這兩個有聯繫的問題,對我們理解把教育作為一生興趣和志業的朱經農當有所裨益。

## 一、一個基督徒眼中的宗教教育

朱經農是新教基督徒,這是事實,但有關朱經農的傳記資料、年譜卻很少提及。朱經農長子朱文長撰寫的訃告中提到:“先君為虔誠之基督教徒,晚年信奉尤篤”。<sup>④</sup>但朱經農何時信教,從屬哪個教派,走向基督教信仰的心路歷程如何,現在還缺乏可靠資料。這其中主要原因來自朱經農本人,他很少提及個人信仰。他在 1926 年一篇談論宗教教育的文章中提到,直到十八、九歲他才聽到福音,是他主動而非被強迫參加禮拜。<sup>⑤</sup>以此推算,朱經農接觸基督教應該是在 1905 年左右。

另外一個材料是他在 1932 年擔任湖南教育廳長時,與長沙基督教職員聯合會聚餐演講,提到“余三十年前在上海某教會研究聖道,受洗歸主。以後每到一處,與教會總有親密的交誼”。<sup>⑥</sup>以此推算,他應該是 1904 或 1905 年去日本留學前就已信教。“某教會”是哪個教會?這篇演講發表在監理會的雜誌《興華週刊》,據此推測他可能屬監理會。朱經農自 1921 年回國服務,在兩個教會大學任過職(滬江大學國文系主任和齊魯大學校長),又在國民政府教育系統擔任高官,這樣的經歷讓他在教會教育界,特別是海外差會中享有很高的地位。作為中國教育界的代表,他曾深度參與中國基督教教育會、高等教育委員會的工作。從 1920 年代末他擔任中國基督教大學協作計劃的顧問,一直到抗戰勝利後,他對基督教大學協作計劃的制定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影響力。

朱經農回國不久就爆發了聲勢浩大的非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無論是作為教育工作者還是基督徒,他都不贊成非理性的反對基督教和教會教育。1921 年,芝加哥大學神學院教授伯頓(Ernest Burton)帶英美合作組考察中國教會教育。伯頓就基督教學校在中國的新學制中應該佔有什麼地位發表了意見,朱經農第一時間將其翻譯成中文,在《新教育》雜誌發表。伯頓認為基督教教育必須適應中國人的需求,而且應儘快將學校移交中國人辦理;公立學校和基督教學校都不可缺少,各有長短,應有互助和通力合作的精神。<sup>⑦</sup>這也是朱經農後來一貫堅持的主張。

在非基督教運動期間,鼓吹收回外人教育權最力的當屬以青年黨人為主的國家主義派,其代表人物是李璜、余家菊、陳啟天等,他們從 1923 年起出版《國家主義的教育》、《國家主義教育學》等著作,以《醒獅》週報作為輿論陣地,闡述他們的教育主張,要求無條件全面禁止教會教育和殖民教育,收回教育主權。1925 年 2 月,朱經農在自治學院的一次演講中批評了國家主義派的教育主張,這激起了對方的辯論興趣,因為自他們提出國家主義教育兩年來,教育界還從沒有反響,公開批評

也只有朱經農的聲音。陳啟天就在《醒獅》發表長文，反問朱經農是否真贊成國家主義的教育方針，有何理由反對收回教育權等。<sup>⑧</sup>

朱經農針對陳的詰問做了回答，解釋他贊成國家主義是因為“正當的國家主義與民治主義不相衝突”。關於收回教育權，他主張分為幾個層次：包含政治侵略意義的學校應該立刻收回；教會學校在政府註冊後，應允許繼續存在，因為教會學校不過是私立學校的一種，文明國家大半容許其存在。另外，中國教育現在未能普及，多一個學校，兒童就多一點受教育的機會，只要教會中小學課程與國家所規定相合。<sup>⑨</sup>他在之後一次演講中對此又做了闡述，指出教會學校當下還存在很多問題和缺點，主要問題是不遵照國家所定的新學制課程。他認為中國在義務教育普及之前，可以暫時允許教會辦小學，但必須遵照國家規定；中學也可以讓他們聚精會神辦幾個好的實驗學校，以供其他公立學校借鑒；大學是無所不包的學府，應有自由容忍的態度，應允許各種宗教學說進入校園，只要他們不違背國情。無論哪種學校，都應該向中國政府立案，按國家規定辦學，取消強迫參與宗教儀式，注重中國固有的文化。他試圖說服國家主義教育派允許教會學校存在還有一個現實原因，即中國教育尚處於萌芽發展時期，師資、經費都還很缺乏，“教會教育殊足補我們力量之所不及；但為了社會的要求，我們不妨要他們改良，以求吻合我們的限度”。<sup>⑩</sup>

在和非基督教人士的辯駁中，朱經農發展了他的宗教教育觀。他認為宗教在教育中有其特別的功用，一方面宗教信仰是個人的自由選擇，“強迫別人信教是應該反對的；強迫人家不信教，也是錯的”。信教自由為文明國憲法所保障，信仰問題應由學生自由選擇，家長和老師都不得干涉。他認為信仰與國家主權也要分開來看，這與政治侵略完全是兩件事。另一方面，宗教教育也是道德教育的一種實驗，宗教的宗旨“不過是勸人為善，學道愛人，並無政治侵略的意義在內，似無絕對不准留存的必要”。<sup>⑪</sup>他認為教會學校可以有宗教教育，但反對教會學校實施強迫式的宗教教育。西教士們認為選修課方式會弱化宗教教育的效果，朱經農總以自身信教經歷為例，說明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他認為如果他的父母以他們的方式給予信仰指導，他可能就沒有機會成為一個基督徒，因為對一個受過現代教育的人來說，只會把宗教看成婚姻，是一種個人選擇，而不是父母之命。因此，朱經農認為強迫式的宗教教育絕對不適合中國國情，只有師生在最大程度上心對心的個人交流，才能真正贏得學生的信仰皈依。<sup>⑫</sup>

朱經農和同時代其他擁有基督徒身份的教育家如晏陽初、陶行知等略有不同，他一直把宗教作為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關懷，並公開鼓吹宗教對教育培養的重要性。1923年初思想文化界開啟“科玄論戰”，朱經農就積極撰文參與，從八個方面對玄學派代表張君勱提出了質疑，特別是關於張氏對物質和精神的劃分。<sup>⑬</sup>此後，朱經農意猶未盡，在1924年3月又完成一長文《科學與宗教》，投給胡適準備創辦的《努力》月報。他在給胡適的信中這樣介紹該文內容：“十分之八是為科學辯護，十分之二是為宗教辯護，因為我是一個誠實信宗教的，我又是極端推崇科學的。我為宗教辯護的地方或者為兄等所不許，兄等盡可發表意見糾正我的錯誤，不過大家不牽涉意氣為是”。<sup>⑭</sup>

朱經農首先批評玄學家們把許多絕不相干的罪名加至科學頭上，譬如科學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批評玄學家們對“科學”和“科學方法”的誤解。同時他也指出科學的局限性：“科學對於宇宙之謎，只發見了‘第二步’的原因，並沒有得着根本的解決。”因為宇宙之謎得不到解決，由此就要想到上帝，在朱經農看來此即宗教產生的緣由：“因為世界上的人不能全憑理智，滅絕感情。對於‘虛空無着落’的宇宙，‘茫渺無由來’的萬物，若不尋出一個根源來，於情實有所不安。人生百年，只如曇花一現。生何自來？死將安在？前途渺茫，了無歸宿。在此黑暗中摸索，熱烈之情感，將何向所寄

託？於是不可知之境界中遂有種種假設。科學的止境即為宗教之起點。宗教是安慰情感的妙品，於人有益，而與科學並無不能相容之處。”據此，朱經農得出了結論：宗教與科學應該是相輔相成，不該相互攻擊；科學家在沒有得着充分證據以前，也不能“無端闖入不可知的境界中，無端推翻宗教的信仰”；而宗教家也不應憑着空想來推翻科學已經證明的事實，更不應該無端仇視科學。<sup>⑤</sup>

朱經農把科學與宗教的思考也融入他的教育思想。他在抗戰中完成的《教育思想》專列一章“科學與宗教”，觀點與上文基本一致。但該章以王陽明和文天祥為例說明他對宗教信仰的理解。在朱經農的理念中，王陽明的“良知”即是超絕時空的天理，就是基督教《約翰福音》所講的“太初有道”的道；王陽明雖未直說神或上帝，但他講的“理”是絕對至善，無始無終，無時不有，無處不在，恰似耶教所謂的“聖靈”，至善之理，就是耶教的道。而文天祥的《正氣歌》所講的天地正氣，“充塞乎天地之間，創造山川河嶽，創造日月星辰。在人身上表現出來，便是浩然之氣，便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便是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朱經農認為這就是一種信仰，也是中國立國的精神，雖然名稱各異，稱神或稱上帝，或稱真宰，或稱佛，“其實大家信仰中都有一個全知全能，大仁大愛，創造宇宙，化育萬物的真神存在”。<sup>⑥</sup>因此，朱經農強調不宜抹殺宗教信仰在教育過程中的作用，因為教育即生活，人類生活不能缺少宗教的要素。在抗戰時期，朱經農提出不僅要用科學建立“物質的國防”，也必須建立“精神的國防”，就包括不可忽視宗教，因為“天地正氣，和內心的靈明，都發源於宗教信仰……不提倡宗教，信仰宗教，不容易產生‘視死如歸’‘殺身成仁’‘從容就義’的國民”。<sup>⑦</sup>

尤為注意的是，朱經農在這本著作中破天荒用了祈禱式的語言：“我們祈求神賜給我們更多的智慧，更大的愛心，更強的理解力，廓清許多誤解，認識真正的天道”。<sup>⑧</sup>朱經農在執掌光華大學時力倡“愛的教育”，即“先生與學生，同學與同學之間用親愛精誠的精神相互合作”，反對“恨的教育”，“如果心裡懷着恨的心理，要革命，要流血，要鬥爭，要清算，那麼不必來”。<sup>⑨</sup>雖然他的初衷是要避免學生捲入黨派之間的政治鬥爭，但“愛的教育”顯然與他基督教的信仰背景分不開。對宗教教育的重視，是朱經農異於同時代其他教育家的一個重要特點。

## 二、從民本主義到三民主義的教育理念

朱經農勤於寫作，有關教育的文章、演講大多散見於報刊，只在抗戰時期出版了兩本著作，即《近代教育思潮七講》（1941）和《教育思想》（1944），可以作為他教育研究的代表作。已有學者從五個方面總結了朱經農的教育思想：兒童本位的基礎教育思想；實用與育人相結合的職業教育思想；美與實相統一的藝術教育思想；理論與實踐學習並重的公民教育思想；知識與精神兼顧的科學教育思想。<sup>⑩</sup>這個歸納比較全面，也很精當。本文無意就朱經農具體領域的教育思想展開論述，僅就他這些思想所呈現的教育理念做些考察。所謂“教育理念”，是指辦教育的根本原則和目標。一個人所秉持的教育理念與他的信仰、價值觀密切相關，國家的教育宗旨也會影響到個人的教育理念。

1919年4月，教育部教育調查會議通過了沈恩孚、蔣夢麟兩人的提案，確定中華民國的教育目標為“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所謂“健全人格”，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私德為立身之本，公德為服務社會國家之本；人生所必需之知識技能；強健活潑之體格；優美和樂之感情。所謂“共和精神”，就是發揮平民主義，人人知民治為立國根本，養成公民自治習慣，人人能負社會國家的責任。<sup>⑪</sup>這個新宗旨發佈在蔣夢麟主編、創刊不久的《新教育》雜誌上，體現了新文化運動以來追求科學與民主的精神，也是杜威在中國的弟子們所追求的教育理念。1924年，已回國三年的朱經農對

此宗旨又做了補充解釋。他梳理西方學者關於教育目的的種種觀點之後，認為 1919 年《新教育》創刊時所題的“養成健全的個人，創造進化的社會”是教育目標的更佳表述。所謂“健全的個人”，他列出的九條標準，包含了以前“健全人格”的全部內容，還增加了能與人合作、有公民常識和能力、了解世界與本國經濟、保持家庭和睦子女受教育、能運用心思有所創作、要有適當信仰等等內容。所謂“進化的社會”，朱經農直接引用了杜威的觀點，即團體之中各分子能通力合作，團體之間也能開誠布公，用和平方法改良社會。<sup>22</sup>簡而言之，朱經農完全遵循了其導師杜威教育哲學中的“民主主義”(Democracy)思想，這也是他一生所秉持的教育理念的核心。

針對當時中國社會的種種弱點，朱經農又提出應加強的幾個具體教育領域，分別是體育與衛生、公民教育、人格教育、科學教育、鄉村教育、義務教育、平民教育。<sup>23</sup>這些名詞可以說是 1920 年代中國教育的關鍵詞，朱經農是其中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不但協助朱其慧、熊希齡(朱的姑姑、姑父)及晏陽初創辦平民教育促進會，與陶行知編寫第一套平民千字課本，還在商務印書館編制全套新學制中小學教科書，把公民教育、人格教育、科學教育等思想貫徹其中，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以後隨著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朱經農職位也不斷變遷，他對教育理念的思考和表述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最明顯的特徵就是“三民主義”教育宗旨的介入，這在他的論著中很容易發現。

“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源於 1928 年 5 月，大學院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出席各方一致同意廢止“黨化教育”的提法，採用“三民主義”教育的新概念。剛從上海市教育局局長轉任大學院處長職的朱經農參與了新教育宗旨的起草。按他的說法，在國民黨領導下的中國教育，“當然要建立一個完全而切於現實情形的教育宗旨，以為領導全民實行訓政、憲政工作的標準”。<sup>24</sup>大學院的教育宗旨草案共有四條，前三條旨在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措施，實現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最後一條提倡國際主義，達到世界大同。1929 年 4 月，國民政府正式公佈了《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其中關於“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表述與朱經農的說法大致相同。此後，朱經農就以“三民主義”作為教育研究的指導思想。這裡以他的《近代教育思潮七講》為例予以說明。

該書是朱經農在齊魯大學擔任校長時的講義。1932 年 1 月他攜書稿赴上海，準備交商務印書館出版，不巧趕上“一二八”事變，書稿葬身戰火。他回濟南後重新起草，緒論和五章的內容陸續發表在《齊大月刊》，但一直未能將全書編成一本系統的著作。他到湖南主持教育行政後，更難有餘暇專門著述，直到 1939 年夏天湖南開辦行政幹部訓練班，他擔任近代教育思潮講座，才將舊時殘稿“有刪有加”編成講義，兩年後出版。

無論是舊稿本還是正式出版本，朱經農都在緒論(引言)中聲明，西方各種教育思潮生機蓬勃，但立場互異，支派繁多，他只選擇對近代教育潮流有重大影響、與中國現代教育有密切關係的思潮，並且要看這種教育思潮與中國環境是否適合，要站在中國教育的立場，來選擇何種學說，最終目標是解決中國各種教育問題。<sup>25</sup>這如同近些年來大陸教育界力倡的“紮根中國大地辦教育”。這裡需要重點指出的是，他從西方所選取的教育理論都給予“三民主義”的洗禮，最終改造成為他認為最適合中國的教育理念。下面舉例說明之。

朱經農把兒童本位的教育列為近代思潮中貢獻最大的一股。國民政府雖然規定“全力發展兒童本位的教育”，但實際上除少數實驗小學略知根據兒童心理，選擇教材，改良教法，大多數辦學的人依然固執成人的意見，把許多不合兒童身心發育的材料強加給兒童。當時有些小學教材不但反對採用物話，並且反對採用白話；有些大城市教育部門居然通令各小學增加讀經課程，想把“修齊治平”、“正心誠意”等等大道理，用“注入式”方法教兒童記憶，讓兒童像鸚鵡學語一般在人前背誦。

這些做法在朱經農的教育理念中,都是違背兒童本位的教育謬說。<sup>26</sup>因此,他把兒童本位教育列為第一章,對自然主義者盧騷(盧梭)、愛倫凱(Ellen Key)、托爾斯泰等兒童教育學說做了細緻的梳理,指出對中國的合理成分和不合理的地方。在該章最後,朱經農援引“三民主義”教育宗旨,提出“使兒童整個的身心融育於三民主義的教育中”、“使兒童個性群性在三民主義教育指導下平均發展”、“使兒童於三民主義教導下具有適合於實際生活之初步的知能”等一系列實施原則。在這裡,朱經農很巧妙地把三民主義教育宗旨與西方自然主義兒童本位的教育思潮融為一爐。

朱經農在該書的其他章節中基本按此模式進行。比如第二章科學教育,朱經農認為這是近代第二大有重要影響的教育思潮。他先介紹孔喬治(George Combe)、斯賓塞、赫胥黎、培根的學說,然後引用孫中山、蔣介石等“黨國先進”關於科學教育的主張,最後把它融入實現抗戰建國的教育方針中。

《近代教育思潮》稿本與商務出版本的篇章比較

1932 年稿本	1941 年商務版
第一章 緒論※	第一講 近代教育思潮鳥瞰
第二章 自然主義與兒童本位的教育※	第二講 自然主義與兒童本位的教育
第三章 唯實主義與科學教育※	第三講 唯實主義與科學教育
第四章 民本主義與普及教育※	第四講 民族思想與普及教育
第五章 實利主義與職業教育※	第五講 唯物史觀與勞動教育
第六章 人文主義與藝術教育	第六講 新理想主義與人格教育
第七章 唯物史觀與勞動教育	第七講 三民主義與教育政策
第八章 新理想主義與人格教育	附錄一 人文主義與藝術教育
第九章 心理學對教育思潮的貢獻	附錄二 心理學對於教育上之貢獻

※已發表於《齊大月刊》

如果比較一下上表中稿本和商務版本的篇章結構,不難發現兩者內容大體一致,所謂“有刪有加”,只是舊稿本中的“實利主義與職業教育”刪除了,商務版加了一章“三民主義與教育政策”,主要內容是對三民主義的要點、國民黨教育政策的確立及實施方案、訓政時期約法與國民教育、抗戰建國綱領與戰時教育實施方案等做了詳細的介紹,凸顯了戰時教育的特徵。

比較這兩個版本還發現一個變化,即稿本中的“民本主義與普及教育”,在商務版中變成了“民族思想與普及教育”,“民本”變“民族”。根據《齊大月刊》發表的文章,朱經農先解釋了民本主義即 democracy(民主,當時也作“民治主義”),是近代教育思潮中的第三種重要的發展,在政治上就是“民為邦本”、“主權在民”;用在文化上,就是教育機會平等;用在教育上,就是指導青年養成一種習慣,在一個團體之內,能夠與人合作,同甘共苦,採他人所長,補自己所短。<sup>27</sup>如前面所述,這是他回國後以杜威教育學說為指導而力倡的民本教育理念,強調普及教育才是改良社會的途徑,為全民政治的基礎,民本主義的實現與普及教育有不可分離的關係。<sup>28</sup>

在商務本第四講中,朱經農講“民族思想”就是人民愛護自己民族的原動力,也就是愛國心,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民族意識,那麼在危急時刻,就不能認識“民族至上”、“民族高於一切”的重大意義,就不能犧牲個人私利與成見,去挽救瀕危的民族,愛護多難的國家。他引用普法戰爭是教育之



爭的例子，德國後來之所以崛起，是因為費希特大倡新教育、積極宣傳教育建國之說。<sup>②</sup>他又引用孫中山的話“中國退化到現在地位的原因，是由於失了民族主義的精神”，因此在當下民族危機之時，政府當局要依照抗戰建國綱領，加緊普及教育，培養民族意識，藉以加強抗戰情緒，充實抗戰實力，以完成抗戰建國兩大使命。<sup>③</sup>這一章跟稿本的詮釋完全是不同的重點。稿本講民本主義思潮帶來了教育普及，教育普及會加強民治社會，而這一章只強調了普及教育的目標是培養民族主義。從這個差異也可以看出抗戰思維對朱經農教育理念的影響。

顯而易見的是，無論是《近代教育思潮七講》還是後來的《教育思想》，朱經農都大量引用“總理”“總裁”言論，《思潮》一書第三、五、六章甚至設有專門小節講述“黨國先進”對科學、勞動、人格教育的主張，以此作為他論述的起點或根據。《思潮》在多處都強調了領袖言論的至高無上，指出國民政府所有教育政策與實施方案，都必須以“三民主義”和“總理遺教”為基本原則。朱經農作為早期革命黨人，一生追隨孫中山，篤信“三民主義”，也出版過“三民主義”的研究成果，是“三民主義”理論的重要詮釋者。<sup>④</sup>因此，作為國民政府教育行政系統的一個重要成員，把“三民主義”教育宗旨與西方教育學說融會貫通並付諸實踐，倒也順理成章。

但需要指出的是，朱經農自始至終反對黨派把持大學教育，主張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他在1931年2月1日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曾充分表達了這個觀點：“現在中國的政客，看見教育界有一種潛勢力，所以都想來操縱教育。……現在國民黨如果想黨化國立大學，也未必有好結果。大學校不是軍隊，不能不容許學者思想自由與講學自由”。<sup>⑤</sup>抗戰時期，國民黨實施“教育統制”政策，對學術獨立損害更大。抗戰勝利後，時任教育部次長的朱經農對此憂心忡忡，曾對外公開宣示，“黨團退出學校，思想不能統制，大學教育必須做到學術獨立、思想自由”。<sup>⑥</sup>從這點可以看出，朱經農雖然堅定抱持“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但並非無原則地支持國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其教育理念的底色仍閃耀著年輕時所追求的“民本主義”的光輝。

### 三、捨學從政：游刃有餘抑或游移不定？

自1921年從美回國任教北大，到1948年11月作為中國代表出席聯合國文教大會，在這27年中，朱經農約有一半時間是在從事教育行政，一半時間在各大學或商務印書館任職，中間經歷了多次政學轉換。在目前所見朱經農同事好友的回憶中，都對他的學問和行政能力給予很高的評價，因此當代學者俞可稱他“為學為政游刃有餘”。<sup>⑦</sup>徐保安對朱經農的職業選擇和仕學掙扎做過分析，認為他終其一生並無一以貫之的人生職業設計，對為政還是為學游移不定，家庭生活壓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他的職業選擇。<sup>⑧</sup>這兩種看法都有事實依據，但仍有可議之處。學人從政在朱經農時代並不少見，著名者如丁文江、翁文灝等，這裡面既有“學而優則仕”的士大夫傳統，更多是近代知識人為實現“學術救國”理想抱負的主動選擇。這裡結合朱經農幾次關鍵的政學轉換，對這一問題再做討論。

1927年7月上海特別市成立，黃郛出任市長，到處網羅名彥，朱經農被選中擔任教育局長。黃郛在就職演說中曾提到他的用人標準：“純以專門學識與辦事經驗為衡，而因上海環境之惡劣，同時尤不得不注重於德性”。上海市政府的高級職員中有黃郛多年深知者，也有素未謀面者。<sup>⑨</sup>朱經農就屬後者，足見其專業與聲譽優良。也有另外一個說法，在北伐勝利前，朱經農曾赴廣州與國民黨中央取得聯繫，回滬後同吳稚暉、楊杏佛等人秘密從事黨務工作，成為受國民黨上層信任的“同志”。<sup>⑩</sup>此前，朱經農擔任光華大學副校長及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哲學教育部部長。根據所長王雲五

的說法，執掌全國第一大都市的教育，“當局認為捨經農莫屬，挽之再三，義不可卻”。<sup>33</sup>這是朱經農第一次進入教育行政領域。他屬下只有 16 位職員，在經費奇缺的條件下，居然把大上海各項教育事業部署得井井有條，而且他還兼任若干私立大學講座。這讓王雲五在敬佩其學識之外，也不得不承認其“兼具行政的長才”。他當時的同事潘公展在回憶中這樣評價他：“胸有成竹，不急就，不躡等，腳踏實地，循序漸進，為未來樹立良好基礎”。<sup>34</sup>然而，剛開創新局面不久，黃郛請辭，朱經農隨即引退。

朱經農辭職還有一層被迫無奈的原因。據韓戎的研究，由於朱經農任職光華期間對國民黨學生有所壓抑，他們就通過上海學聯，控告朱經農組織大學同志會從事“反革命”活動，是“反動中堅、軍閥走狗”。上海市清黨委員會因此召朱經農問話，朱對此極力否認，稱組織加入大學同志會，係代表光華大學加入，否認在光華大學壓抑國民黨學生的事實。然而，學生拒絕諒解朱經農，連篇累牘發表宣言，要求國民黨罷免朱經農教育局長的職務。朱經農最後被迫辭職。<sup>35</sup>

1928 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大學院，朱經農應蔡元培之邀擔任普通教育處處長。大學院改組分出教育部，朱經農又擔任普通教育司司長，很快升任常務次長，仕途一路順利。但由於中央大學的派系之爭，教育部長蔣夢麟與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等人發生衝突，1930 年 12 月 4 日蔣被免職，朱經農也隨後辭職，出任考試院考選委員。此時，中國公學學潮迭起，經費短缺，幾乎無法維持，朱經農又被請來救火。但中公問題非常複雜，學生與黨部之間矛盾不斷，朱經農處於兩者之間，“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做得非常之苦”，他給胡適寫信抱怨，想找機會離開中公。<sup>36</sup>

機會很快就來了。齊魯大學 1929 年申請教育部立案失敗，學潮工潮接踵而來，學校陷於停頓。為讓齊大從絕境中走出，齊大女生部主任麥美德 (Luella Miner) 向時任實業部長孔祥熙求助。孔在義和團時期曾保護傳教士，被麥美德稱為“護教英雄”，後資助他赴美留學。<sup>37</sup>孔祥熙知恩圖報，為幫助齊大迅速立案，親任齊大校董會主席，1931 年 3 月又兼任校長，但他不可能常駐校園，就推薦朱經農做校長。齊大校董會和美國、英國的差會立即開會通過了任命。他們對朱經農表示非常歡迎，其原因不僅僅在於他做過教育部次長，與中央政府有密切關係，能直接幫助齊大立案，更看重他是一位知名教育家，而且被譽為“基督徒君子” (Christian gentleman)，因此深受齊大中外人士推崇。<sup>38</sup>朱經農在 1931 年 7 月上任，12 月齊大就順利立案。齊大在校長空缺一年半之後終於有了理想的人選。

朱經農在齊大任職期間工作頗為順利，生活也安逸瀟灑。按他的說法，學校行政是由各學院院長分任，校長職務也很清閒，正好是他講學、著述的好時光，“本擬趁此機會，補讀平生未讀之書，並對中國教育文化，作一系統研究”。<sup>39</sup>但好景不長，僅一年之後，湖南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卻要求他去湖南擔任教育廳長，重整湖南教育。朱經農“初無重入仕途之意”，因此堅持拒絕，但行政院卻不顧他的意見，於 1932 年 8 月 15 日直接對外公佈了任命。朱經農念其先人曾在湖南辦理教育，只好答應先去半年，最多一年，並承諾一旦幫助湖南建立起新的教育體制，就立即回齊大。齊大校董會也同意做出犧牲，協助國家的教育事業，但要求朱給校董會一書面承諾，到期必須返回齊大。

到 1933 年 6 月，距離朱經農承諾返校的時間還有兩個月，兩邊就開始了密集的函電交涉。<sup>40</sup>6 月 6 日，湖南省主席何健率先給孔祥熙寫信，要求朱繼續留任，但齊大堅決不同意朱延期。多重身份的孔祥熙成為各方都遊說的對象，他先是支持齊大校董會的意見，但接到蔣介石要求朱留任的電報後，又建議齊大再給朱一年假期。夾在齊大與湖南中間的朱經農無所適從，壓力越來越大。各方電報你來我往，過程頗為精彩，這裡不再詳述。<sup>41</sup>簡要地說，朱經農在反復權衡中不得不痛下決心，



於8月2日不辭而別離湘回魯，但緊接著就是包括蔣介石、汪精衛在內的黨國要人給他施壓，最後朱經農不得不向齊大辭職回湘。這次捨學從政對朱經農來說是最難以抉擇、也是最痛苦的一次。

齊大是英、美、加拿大的十多個差會共同支持建立的，差會之間、中外之間關係複雜，矛盾不斷，難得如朱經農這樣一位令齊大各方人士都非常滿意的一位校長。朱經農的離去，對剛剛走上發展軌道的齊大而言是當頭一棒。如果聯想到齊大此後為尋找各方都滿意的校長人選所付出的代價，包括三年多的尋找時間，齊大內部的分裂，這樣的結局自然讓齊大感到很不公平。<sup>47</sup>

當然，湖南也需要朱經農，一個省的人口總比一個大學要多很多，這也是湖南方面用來說服朱經農的主要理由，這是國家教育建設的需要，作為一位有著學術報國理想的知識分子，在這強大的理由面前欲辯無言。

齊大損失就是湖南受益。朱經農在湖南教育廳長任上居然一干就是10年半，省主席都換了三個。他或許是民國時期主政一省教育行政時間最長的官員。他到任後大刀闊斧整頓教育，很快取得了湖南人民和何健的信任。為解決鄉村教育經費長期短缺問題，他創造性提出了“募田募山”的新方法：“欲謀一勞永逸，首在募田募山，田能收稻，可發實物；山能種植雜糧果樹，亦可解決經濟困難”。<sup>48</sup>這裡不去詳列顯示教育進步的數字，可以引用同事余先礪的一段文字來說明之：

在那十年中，無論學制的革新、學校的增設、教學的改進，殆有如荊棘叢中，漸見生機蓬勃，光彩煥然，桃李滿園，弦歌不絕，況值時局動盪不寧，政府撥遷無定，先生以其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的精神，在動亂中求安定，在艱苦中求進步，用能誠樸做人，創造奇跡。<sup>49</sup>

朱在任期間提前完成了國民普及教育計劃，實現“一鄉鎮一中心學校，一保一國民學校”。考慮到當時湖南經濟不算發達，而且還是在全民抗戰的環境下，在當時就能實現基本的義務教育，堪稱一大“奇跡”。

然而，朱經農在湖南的教育實踐並非一帆風順，除了面臨教育經費、人才緊缺的困難，當地黨派之爭也蔓延到全省教育界。朱經農設法制止各級學校沾染黨派色彩，對湘局穩定和中央政策的貫徹有相當貢獻。<sup>50</sup>

1943年2月，蔣介石以行政院長身份兼任中央大學校長，就把朱經農從湘省調來擔任中央大學教育長，主持校務。由此可見蔣介石和當時教育部長陳立夫對他的信任，也有人由此把朱經農列為CC派。<sup>51</sup>一年後，1944年3月蔣辭去校長職務，朱經農被陳立夫安排轉任教育部政務次長。抗戰勝利後，朱經農辭去教育部次長職務。據朱文長回憶，朱經農因從政已久，對於宦海浮沉，早有倦勤之意。這時王雲五因為從政，就請朱經農執掌商務印書館。朱對管理工人並無經驗和自信，但他還是聽從了王雲五的勸說。他同時兼任光華大學校長，又回到他擅長的教育一線。

1948年11月，朱經農代表中國政府出席聯合國文教會議，這是他最後一次出任公職。會後他未及返回中國，見國民黨大勢已去，遂決定轉道美國，從事講學和教育研究，1950年8月到哈特福德神學院就職。《愛山廬詩鈔》中有一張朱經農和傳教士葛德基(E. H. Cressy)的照片。葛德基曾長期擔任中國基督教教育會和高等教育委員會的負責人，跟朱經農熟悉，朱所以能在哈特福德神學院工作，應是葛德基的邀請。

從上面所述朱經農政學之間的頻繁轉換，可以看出他的官職都是隨著政府任免而被動轉換，有些是符合他意願而就職，如上海教育局和國民政府教育部的職位；有些是他經過反復思考而痛苦抉擇，如離魯赴湘；有些則是權勢者和老朋友的邀請。大部分職位選擇幾乎都受到外界影響，甚至是

不得已而為之，在實際工作中也遇到方方面面的困難和阻力，並非都順風順水。因此，認為朱經農為學為政游刃有餘，一切都在其掌握中，作為時人對朱經農學識和能力的讚譽可以理解，但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另一方面，朱經農的政學轉換確實頻繁，顯得游移不定，他在各個崗位的任職時間最長達十年半，短則一年半載，頻率之高也是民國時期政治、社會劇烈變動的一個表徵。需要廓清的是，這並非說明朱經農只是隨波逐流，沒有一以貫之的職業追求。他晚年在一次演講中坦白他的專業學習經歷。他出國留學時最早關注比較憲法、政府、國際法等政治學功課，但很快認識到“每一種政治變革，裡面包含一種政治理想”，所以他的興趣就由政治學轉向思想史，進而又認識到“一種思想的傳播，不能不靠教育”，因此，他又專習教育及人類思想進化史，“一直到現在，我的興趣，還是在這一方面”。<sup>53</sup>由此可見，教育是朱經農一生的興趣和志業，無論是為學還是為政，他從沒有離開過教育事業，他不是書齋裡的教育家，而是一位懷抱救國理想、躬行實踐的教育家。從這點出發，我們或許更能理解王雲五稱朱經農為“全面教育家”實乃不易之論。

### 餘論：廣被弦歌抑或一場空夢？

1942年9月，湖南省教育廳在耒陽開會，慶祝朱經農就任廳長十周年。余先礪和同事合撰一聯，懸掛在戲台，以表彰朱經農十年成就，其聯曰：

樹木易，樹人難，十載辛勤，敢云七澤三湘，遍栽桃李；  
秋風清，秋月朗，一場粉墨，藉使千門萬戶，廣被弦歌。<sup>54</sup>

面對各方的交口讚譽，朱經農卻這樣評價自己：“各項有關教育之數字，年有增益，咸改舊觀。然以丁茲時會，復苦才輕任重，深恨未達成吾人之理想”。<sup>55</sup>

1951年2月27日，就在他去世十天前的日記中，他對自己一生做了如下感言：

我為同盟會員，民元轉入國民黨，對黨始終如一。黨當政時，我只守黨紀，不爭黨權。黨失敗時，流離顛沛，絕不背黨。國民革命初步成功，十七年國府成立，余因黨的關係，捨學從政，浮沉二十餘年，至今思之，實為重大犧牲。倘以二十餘年光陰從事學術研究，埋頭著述，則今日成就絕不止此。從政二十餘年，所做建設工作，均被戰事摧毀。至今回思，一場空夢。今年老力衰，雖欲從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sup>56</sup>

這則日記可以看做是朱經農的夫子自道。他本人對捨學從政、因政誤學還是懷有極大的遺憾，他原本更願意做一個書生。其實，朱經農此前就表露這樣的想法：“我歸國之後，大部分的時間，卻消磨在教育行政中間。不是辦地方教育，就是辦大學行政事務。許多該讀的書，沒有機會多讀，許多應該發表的思想，也沒有功夫把他寫成有系統的著作。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夠拋開一切行政工作，閉戶讀書，寫幾本粗淺的著作，把自己的思想表達出來。俗話說得好，若要好，學到老。我自己很慚愧，一切學問都沒有研究得徹底”。<sup>57</sup>

朱經農晚年流落美國，從東海岸到西海岸，一路困苦和疾病，身體稍微康復就“努力讀書，續事著作”，終於有機會潛心治學了。可惜的是，中道殞喪，他擬定的《中國教育思想簡史》尚未完成，“遺稿盈尺”。如果假以時日，以他從事中國教育三十餘年的經驗，加之飽讀中外古今教育思想，他或許能完成他計劃中的皇皇巨著，造福於中國教育界。

但這樣的遺憾不完全是朱經農個人選擇的結果，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教育救國”、“學術救國”的必然產物。朱經農的昔日老友王雲五評價他是“身在教育，而心不忘國家與人群”。另

一位同事潘公展評價他是“不只以言教而以身教的教育家”。<sup>57</sup>有這樣抱負的教育家豈能安於書齋著述？無論是教書育人還是教育行政，朱經農都是為了實現“教育救國”的夢想，只是個人際遇與時代環境讓他壯志未酬，生發出如此“一場空夢”的感慨。

朱經農所謂“至今回思，一場空夢”，實際並不盡然。至少朱經農在湖南、在商務印書館、在齊魯大學等都留下了很多看得見的成績，還有他主編的數種流行全國的教科書，他的教育言論和著作，今天都已成為中國教育思想的寶藏，值得進一步發掘。

湖南現代著名教育家劉壽祺曾長期在朱經農部下任職，1935年開始擔任義務教育實驗區主任和民眾訓練指導處幹事。朱經農到中央大學和教育部任職時，劉壽祺跟隨並擔任秘書和督學，是朱非常得力和信任的助手。劉壽祺在1938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且利用國民黨政府職員的公開身份，保護了一些進步青年和地下黨組織。他對朱經農有這樣的評價：

他是一個知識淵博、學貫中西的學者，雖在政界漂浮一些時間，卻不是縱橫捭闔的政治家。他是一個正直無私、忠誠勇敢的愛國主義者，又是一個真誠勤勞、立己立人的教育家。無論在耒陽、在重慶他對我黨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起到了一些掩護作用，保護了一些進步青年，雖不是完全自覺的主動的，但對黨對人民是有益的。<sup>58</sup>

這是一個資深共產黨員對更加資深的國民黨員的評價，超越了意識形態和黨派分歧，立場客觀，雖然不是中共官方的蓋棺論定，但這樣的評價可以稱作是實事求是了。

①關於朱經農的傳記材料，重要者有朱文長所編輯的《愛山廬詩鈔》（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張達人：《朱經農先生年譜（初稿）》，台北：《湖南文獻》，第11卷第4期（1983）、第12卷第1~2期（1984）連載。

②③④王雲五：《我所認識的朱經農先生》，載《愛山廬詩鈔》，第152頁；第157頁。

③主要文章有智效民：《詩名應共宦名清——關於朱經農》，台北：《傳記文學》，第472號（2001年9月），該文亦收錄於《胡適和他的朋友們》（增補本），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李卯：《朱經農基礎教育課程思想及實踐研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李卯：《近代教育家朱經農教育思想的全面解讀》，武漢：《江漢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徐保安、李萌：《詩名還是宦名？——從朱經農看民國知識分子的職業選擇與人生處境》，南京：《民國研究》，總第26輯（2014年秋季號）；韓成：《戰後中國私立大學的治理困境——以朱經農執掌光華大學為例（1946-1949）》，合肥：《安徽史學》，2018年第5期。

④朱經農著，朱文長箋注：《愛山廬詩鈔》，第126頁。

⑤⑫King Chu, Compulsory Religious Instruction, Shanghai: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57, No. 5 (May 1926).

⑥《朱廳長經農演講》，上海：《興華週刊》，第29卷第41期（1932年10月26日）。

⑦褒敦(Ernest D. Burton)撰：《基督教學校在中國教育系統中所佔地位》，朱經農譯，上海：《新教育》，第4卷第3期（1922年3月）。在收回教育權運動愈演愈烈時，該文曾被《河南教育公報》（1924）等多家轉載。

⑧陳啟天：《請問贊成國家主義的朱經農君》，上海：《醒獅》，第21號（1925年2月）。

⑨⑪朱經農：《為國家主義的教育答陳啟天君》，上海：《中華教育界》，第14卷第11期（1925年5月）。

⑩《中國教會學校改良譚——在南方大學講演》，上海：《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卷第2期（1925年6月）。

⑬朱經農：《讀張君勳論人生觀與科學的兩篇文章後所發生的疑問》，北京：《努力週報》，第55期（1923年6月3日）。亦見《晨報副刊》1923年6月18日。該文後收入汪孟鄒編輯的《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年）。

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

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75頁。但因種種原因《努力》月報未能創刊，《科學與宗教》後發表在《文社月刊》第1卷第11、12合冊（1926年10月）。

⑮朱經農：《科學與宗教》，上海：《文社月刊》，第1卷第11、12合冊。

⑯⑰⑱朱經農：《教育思想》，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文庫本，第78~80頁；第91頁；第85頁。

⑲朱經農講、汪公暇錄：《施行愛的教育的光華大學》，上海：《上海教育》，第5卷11、12期合刊（1948年6月15日）。

⑳李卯：《近代教育家朱經農教育思想的全面解讀》。

㉑上海：《新教育》，第1卷第3期（1919年4月）扉頁。

㉒㉓朱經農：《教育的目的》，上海：《申報·教育與人生週刊》，第16期（1924年1月28日）。

㉔朱經農演講、鄭精忠筆記：《中華民國教育的宗旨》，南京：《教育月刊》，第1卷第12期（1928年7月）。

㉕㉖㉗㉘朱經農：《近代教育思潮七講》，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第1頁；第2~3頁；第5頁；第64~65頁。

㉙㉚經農：《民本主義與普及教育》，濟南：《齊大月刊》，第2卷第8期（1932年6月）。

㉛朱經農：《孫中山先生學說的研究》，上海：新時代教育社，1928年。

㉜㉝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30頁；第445頁。

㉞《教次朱經農氏談思想不能統制》，漢口：《大剛報》，1946年2月11日。

㉟俞可：《朱經農：為學為政游刃有餘的全面教育家》，上海：《上海教育》，2015年4月B刊。

㊱㊲徐保安、李萌：《詩名還是宦名？——從朱經農看民國知識分子的職業選擇與人生處境》。

㊳沈怡：《上海市工務局十年》，台北：《傳記文學》，第

99號（1970年8月）。

㊴㊵韓成：《北伐前後的校園政治與學生運動——以上海光華大學為中心》，上海：《史林》，2018年第1期。

㊶㊷潘公展：《紀念一位中國教育家》，《愛山廬詩鈔》，第150頁。

㊸Luella Miner, *Two Heroes of Cathay, an Autobiography and a Sketch*,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3.

㊹Mr. King Chu's Resignation, *Cheeloo Monthly Bulletin*, No. 1, Sep. 30. 1933, New Haven: Archives of United Board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G11-265-4263.

㊺㊻㊼朱經農：《十年回憶》，長沙：《湖南教育月刊》，第33、34期（1942年10月13日）。

㊽各方函電見 President Chu's Resignation, RG11-267-4273。這是齊大校方在“朱經農事件”結束後對各方函電彙編而成的小冊子，共20頁，未公開出版。

㊾劉家峰：《校園政治與中西博弈：齊魯大學立案前後的易長風波》，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

㊿㊽余先礪：《湘省教育的輝煌史頁——紀念朱經農逝世十週年》，載《愛山廬詩鈔》，第148頁。

㊿賴景瑚：《一代鴻儒》，台北：《湖南文獻》，第11卷第2期（1983年4月）。賴在抗戰前後數年任湖南省黨部特派員，與朱經農密切合作。

㊿劉壽祺：《朱經農與湖南教育》，《湖南文史》，第34輯，長沙：湖南文史出版社，1982年。

㊿朱經農：《我怎樣求學》，上海：《讀書通訊》，第155期（1948年5月）。

㊿朱文長、朱文華：《先君經農公逝世前後》，載《愛山廬詩鈔》，第126頁。

作者簡介：劉家峰，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濟南 250100

[責任編輯 陳志雄]